

·海外遗珍·

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

(英)何大伟(David Helliwell)撰,许海燕译,
(德)邵玉书(Joshua Seufert)、刘楠楠审校

编者按:2002年4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何大伟先生在会上提交了论文《英国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201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获得牛津大学及大英图书馆仿真影印出版其馆藏《永乐大典》的授权,并在何大伟先生的帮助下,陆续与欧洲其他《永乐大典》的收藏机构取得联系,分别获得出版授权。目前,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及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已经出版,大英图书馆及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藏即将于2016年出版,欧洲藏其他《永乐大典》也将陆续出版。以此为契机,何大伟先生在2002年所撰写的论文基础上增补有关信息,修订完成此文。由于原文系由英文撰写,恐不便学界使用,故特为译出,以飨读者。

关键词:《永乐大典》 欧洲 收藏情况

目前欧洲共收藏59册《永乐大典》,其中英国51册,德国5册,爱尔兰3册。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大英图书馆24册,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19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5册^①,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4册,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3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2册,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1册,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1册。英国的图书馆中曾经还有两册《永乐大典》:一册在伦敦图书馆,1971年被售予纽约的一个商人,后来不知所踪^②;另一册在阿伯丁文法

①其中1册属于大维德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藏书,该基金会由亚非学院管理。

②该册包含卷11368-11369,共44页,Wilfred Merton先生于1914年5月或6月捐赠给图书馆,他当时的地址是Highfield, Slindon Common, Nr Arundel, Sussex。1971年4月27日,该册出现在苏富比(Sotheby)拍卖会上,是第273项。纽约商人Martin Breslauer以700英镑的价格拍得此册。袁同礼及张忱石的书目里都收录了这一册(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图书季刊》新一卷三期,1939年,第246-286页;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版中也收入了这一册(第222册)。1914年,Merton还将自己收藏的一册借给伦敦图书馆供其展览用;1954年,他将这册捐给了切斯特·比蒂图书馆(见下文表格卷19865-19866)。

中学图书馆,很可能毁于该校 1986 年的一场大火,那场火烧掉了图书馆及其藏书^①。

下文将会列出表格,介绍上述藏书的细节。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很少一部分在私人收藏家手里,或者是在其他图书馆但无人能识别。还有,某些曾经收藏在欧洲的卷册后来又出现在其他地方。比如,翟理斯(Herbert A. Giles)曾经藏有 5 册,但是只将其中两册交给了英国的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剑桥大学图书馆各 1 册),其余 3 册则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②。1919 年夏,梁启超游历

①是 Alan Knox 博士引起了我对该册入藏及消失情况的注意。据该校校刊记载,1905 年,该册经由 Hynd 先生入藏阿伯丁文法中学。1922 年,白菜喜(James Russell Brazier)先生向阿伯丁大学捐赠了另一册《永乐大典》(见下文表格卷 11907),对该捐赠的记录中也提及了入藏阿伯丁文法中学博物馆的那册《永乐大典》。这两位都曾经是该校学生,白菜喜就读时间为 1878-1880。1900 年两人都目睹了使馆区被包围,当时白菜喜受雇于清朝皇家海关,Hynd 受雇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Aberdeen Grammar School magazine, 8:2, March 1905, p41; 25:2, March 1922, p82)。

②翟理斯所藏《永乐大典》中的卷 19789-19790 入藏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即今大英图书馆),卷 19742-19743 入藏剑桥大学图书馆。入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 3 册分别是卷 13344-13345、19742-19743 及 19792。只有卷 13344-13345 的入藏情况记录了从翰林院获得该册的人就是翟理斯的儿子翟兰思(Lancelot),这一过程记录在翟兰思的日记里(Giles, Lancelot: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a diary*. Nedlands: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s, 1970, p126;另见下文表格)。

③Giles, Lionel: A note on the *Yung Lo Ta Tien*, *The New China review* 2:2, April 1920, pp137-153。在全盛时期,鲁扎克书店曾经出售过好几册《永乐大典》。该书店有一份特别书目,即“一位具有文学品位及专业学识、过去几年在北京生活的绅士的中国藏书目录”,里面包含了卷 11887-11888 及 13876-13878,这两册后来收藏于大英博物馆(Luzac & Co: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a uniqu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ss., scrolls and paintings offered for sale by Luzac & Co., compiled by Lionel Giles, M.A.* London, 1908, pp19-20)。目录中提到的这位绅士就是巴克斯(Edmund Trelawney Backhouse)。他所藏图书的大部分后来入藏于博德利图书馆,包括鲁扎克书店目录里的大部分及另外 11 册《永乐大典》,但是此前已有部分图书售予他人。1912 年他们的广告中又出现两册: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卷 15950-15951 及现藏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卷 15957-15958(Luzac & Co: *Bibliotheca orientalis*, XI. London, 1912)。次年的广告中又出现 3 册,但是未注明卷数(Luzac & Co: *Bibliotheca orientalis*, XIII. London, 1913)。1919 年的广告中出现 5 册:其中 3 册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即卷 13494-13495,13506-13507,20648-20649;卷 13991 之前被番禺叶恭绰收藏,后来下落不明;卷 20478-20479 之前也被叶恭绰收藏,现藏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Luzac & Co: *Bibliotheca orientalis*, XVIII. London, 1919)。这就是梁启超购买的 7 册中的 5 册;另外两册是卷 19781-19782 及卷 19783-19784,这两册都未出现在鲁扎克的目录中,现在都收藏在康奈尔大学。最后,还有一册出现在他们 1926 年的一个简短的目录中,即卷 19737-19739(Luzac & Co: *A short list of second-hand book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1926)。这就是亚伦卷(Allen, R: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being the diary of the Rev. Roland Allen* M.A.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901;另见下文表格),最终入藏剑桥大学图书馆。由于鲁扎克书店的档案大约 20 年前就被处理或者销毁,因此无法确定上述《永乐大典》的来源。编者按:根据张升先生考察,在英国购买《永乐大典》卷 13494-13495,13506-13507,20648-20649(即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实为叶恭绰(张升:《梁启超、叶恭绰与〈永乐大典〉的收藏》,《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 年第 2 期)。

英国期间,从伦敦鲁扎克书店(Luzac & Co.)购买了7册^③。这些后来全部被带出英国:3册回到中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2册藏于康奈尔大学图书馆;1册藏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另外1册下落不明。

上述藏书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查明其来源。从已知的来源看,这些书的踪迹均可追溯至1900年6月23日星期六翰林院被毁那天。尽管之前有成千上万册已经被转移,尤其是编纂《四库全书》期间,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欧洲所藏《永乐大典》是翰林院被毁之前从中国流失的。

当时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持续高涨,至1900年春的义和拳运动达到顶峰。为了安全起见,北京的外国侨民聚居在靠近紫禁城东南角的一大片使馆区。英国使馆是最大的一个,其北边就是翰林院的南墙,当时聚集了使馆工作人员、清朝皇家海关工作人员、当地传教士及其他工作人员,还有从大沽登陆、前来保护使馆的部分英国军队。从6月中旬外国侨民撤回使馆开始,至8月14日联军进入北京解救他们,这段时间就是众所周知的“使馆之围”。

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义和团袭击外国人是合法的,并对其采取招抚政策。6月23日星期六,大约250名士兵在董福祥的率领下占领了翰林院并在那里纵火,希望火势能趁着北风蔓延至使馆区。在此之前,外国人不得进入翰林院,他们也深知中国人对翰林院所怀的敬畏之情。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认为不但要及时灭火,以免火势危及使馆,而且还要将威胁使馆安全的士兵驱逐出去。与此同时,一小拨人得到英国海军上校B. M. Strouts的允许而进入翰林院,Strouts是英国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①。在普尔上校(Captain Francis Poole)的带领下,一个由10名英国海军、5名美国海军、5名海关志愿者,以及《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和英国使馆的实习译员巴尔(L. H. R. Barr)组成的小队破墙而入。普尔上校是英国军官,当时在北京学中文。使馆被围期间,他受命指挥志愿者保卫使馆区北边的边界。他们驱逐了中国军队,并扑灭了翰林院大火^②。

之后,他们顺手牵羊拿走了一些《永乐大典》的残馀卷册。而在此之前,据报道,双方都曾使用大量《永乐大典》的卷册来加固各自的防御^③。

从事后拍摄的一张照片来看,普尔当时坐在翰林院里,地上堆积的书看上

①Strouts负责保护使馆区,他腹部受伤,于7月16日星期一因伤死亡,年仅30岁。使馆被围期间,翟兰思拍摄了一些照片,其中一幅就是Strouts埋葬的地方,该底片现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

②Grinstead, E.D: *The Yong-lo ta-tien: an unrecorded volume, The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26:1/2, 1962, pp30-33; 摘自普尔未发表的日记;Giles, Lancelot: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a diary*, p186;Allen, R: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being the diary of the Rev. Roland Allen M.A.* pp125-127;Oliphant, N: *A diary of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in Peking during the summer of 1900.* London: Longmans, 1901.pp38-39;等。

③Arlington, L.C. & Lewisoh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Peking: Henri Vetch, 1935. p16.

去像《永乐大典》。他获取了一册,1960年,他的遗孀将其卖给了大英图书馆^①。Thomas Biggin(身份未知,很有可能是英国海军士兵)在翰林院的废墟中“发现”一册《永乐大典》,并于1907年赠予博德利图书馆^②。目前亚非学院收藏的两册《永乐大典》似乎是莫理循所得^③。翟兰思在其回忆录里写道:

翰林院几乎被付之一炬。人们试图抢救著名的《永乐大典》,但是大量的卷册已经被毁,只好放弃。我得到了卷13345(!!),仅仅是作为一个标本而已。

实际上,他拿到的不止一册,他后来捐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就是另外一册^④。白菜喜拿到了至少3册,使馆被围期间,他就职于清朝皇家海关总税务司。1922年,他将其中一册捐给了自己的母校阿伯丁大学;1954年,他儿子将另外两册售予切斯特·比蒂图书馆^⑤。柏林人种博物馆所藏4册中的3册来自斯泰老(E.A.W.von Strauch),使馆区被围期间他也受雇于清朝皇家海关^⑥。

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其他册的来源,要么根据原书上的题词确定,要么根据二手资料确定,但是都指向在使馆被围期间或随后与公使馆相关的人员。

这些人非但不承认自己是贼,还把自己当成是这些稀世珍宝的救星。最先出版这段经历的是罗兰·亚伦(Roland Allen),他是英国公使馆的牧师,自己也获得了一册《永乐大典》:

英国人对翰林院这些文学珍品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有趣了。在那种危机关头,那些志愿者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自救,他们还采取实际行动去保护存放在高墙之内的那些精美的、无价的手写本……^⑦

①Grinstead, E.D: *The Yong-lo ta-tien: an unrecorded volume. The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26:1/2, 1962, Plate XV;另见下文表格卷6933-6934。

②见下文表格卷14607-14609。

③见下文表格卷3944-3945,13629。但是,这两册并不在Leonard Arousseau所见的莫理循在北京的10册私人藏书之中(Arousseau, L: [Review of Miao Quansun's 缪荃孙 *Qingxuebu tushuguan shanben shumu*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 Shanghai, 1912].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2:9, 1912, pp80,82-86)。该藏书以西文为主,1917年8月售予岩崎久弥(Baron Hisaya Iwasaki)(Enoki, K: *Dr. G.E. Morrison and the Toyo Bunko: in celebration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transfer of Dr. G.E. Morrison Library to Baron Iwasaki*(1917-1967). Tokyo: The Toyo Bunko, 1967, p30)。直到1920年莫理循去世之后,岩崎久弥才得到他藏书中的7册《永乐大典》(同上,p36, n.3)。1924年,岩崎久弥成立了东洋文库(Toyo Bunko),这7册《永乐大典》也随之进入东洋文库。其余3册中,两册被康奈尔收藏,一册被大英博物馆收藏(见下文表格卷15955-15956)。

④Giles, Lancelot: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a diary*, p126;见下文表格卷16343-16344。

⑤见下文表格卷11907,803-806,10110-10112。

⑥见下文表格卷903-904,1033,13189-13190。

⑦Allen, R: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being the diary of the Rev. Roland Allen M.A.* pp127-128。

著名的汉学家翟理斯(翟兰思之父)在当时一份流行的刊物上说了下面一段话:

……只有外国人伸出手去挽救(《永乐大典》),使其幸免于难。而在此之前,他们则被拒之门外。^①

他们和其他记录自己经历的人一样,都知道随着翰林院被毁,中国失去了一件最宝贵的文学宝藏^②。

1922年,一位英国军官试图向大英博物馆及博德利图书馆出售3册《永乐大典》。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一封信里被详细记载。该信夹在博德利图书馆的第一本《永乐大典》里。这本《永乐大典》是Thomas Biggin于1907年赠送的。除该信外,还发现了上述三册《永乐大典》的首页照片^③。从这封信里我们得知,这3册是被“一个德国军官拯救的”。结果,他们后来归莱比锡大学(Leipzig University)所有,并于1955年12月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归还给中国^④。汉堡大学(Hamburg University)曾经拥有两册《永乐大典》,但是这

①Giles, H.A: *Encyclopædia maxima,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290, April 1901, pp659-665.

②亚伦(在前所引文中)提到一份报告,即英国外交官宴纳乐(Claude Macdonald)曾经向总理衙门报告了翰林院古籍遭破坏的情况,但是总理衙门对此置之不理。Arlington & Lewisohn也证实了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Arlington, L.C. & Lewisoh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Peking: Henri Vetch, 1935. p18)。Oliphant观察到,“当朝的大部分档案都获救了,很多在10天之前就被转移了”,他的观点是,中国人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在翰林院着火的时候“自己尽量减少损失”(Oliphant, N: *A diary of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in Peking during the summer of 1900*, p39)。

③见下文表格卷14607-14608。

④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第38页。另见下文表格。说到物归原主,博德利图书馆1950年所得7册《永乐大典》(见下文表格卷807-808)可以为此增加一些谈资。1951年1月,李约瑟(Joseph Needham)致信Freddie Beeston,信里提到他也是这件事情的参与者,“在目前国际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向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赠书(据他说是8册)“以示好”,他还询问博德利图书馆是否愿意赠送或者转售这几册《永乐大典》。Freddie Beeston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北京“很难被当作储存这些珍贵图书的安全之地”,他进一步强调,如果不考虑博德利及世界上其他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仅仅归还这7册是不合逻辑的。在回信里,李约瑟说,中国国家图书馆储存善本图书的方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的看法有所保留,“如果美国在那儿投一颗原子弹,书库也无济于事。不过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情况,这个国家也一样不安全”(Beeston, A.F.L: *Seven new volumes of Yong-lo ta-tien. The Bodleian Library record* 3, 1950-1951, pp198-200)。博德利图书馆,RC86/285。

2册后来被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用来与中国交换其他图书^①。还有64册曾经被“俄国及日本侵略者掠夺”,后来被苏联收藏,但是“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这些书在20世纪50年代被分三批归还中国^②。

以上就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欧洲所藏《永乐大典》的情况。问题是,是否还有更多的《永乐大典》在等待人们发现?某些卷册有可能在私人收藏家手里,比如大英图书馆1989年入藏的那册^③,或者在与使馆之围相关的使节或其他家庭手里;除非这些《永乐大典》被捐给图书馆或者出现在市场上,否则我们无从知晓。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些《永乐大典》躺在那些通常没有中文藏书的图书馆里,因而无人识别,就像最近被鉴定的藏于阿伯丁大学的那册^④。

①德国的收藏情况还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查,下文介绍的大部分情况仅仅是通过口头交流而获得的。20世纪初叶,福兰阁至少获得了两册《永乐大典》,卷975-976和卷10483-10484,这两册他捐给了汉堡大学(Franke, Otto: Zwei wichtige literarische Erwerbungen des Seminars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 zu Hamburg Mitteilungen aus dem 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 zu Hamburg. Jahrbuch der Hamburgi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Anstalten. 7 Beiheft. Bd 32, 1914)。1951年,他的儿子傅吾康从中国回到汉堡(自1935年起,他就在中国求学),后来他用这两册《永乐大典》去同中国交换其他图书。这两册《永乐大典》的下落现在是个谜:他们不在福克斯(Fuchs)的书目(Fuchs, W: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Band XII, 1: Chinesische und mand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66)中,这说明1966年之前他们就被还给中国了;但是在张忱石的书目中,他们还在汉堡,因此这两册书的下落可谓扑朔迷离——因为他们出现在中华书局1960年的影印版中。傅吾康本人手里还有一册《永乐大典》,20世纪80年代,他将这册售予普鲁士文化基金会图书馆(即今柏林国家图书馆);见下文表格卷7078-7080。袁同礼和张忱石的书目中都指出柏林Dahlem的Museum für Völkerkunde(2000年更名为柏林人种博物馆)藏有4册《永乐大典》,见下文表格卷903-904,1033,4908-4909,13189-13190。上述几册福克斯都曾经介绍过,并收入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版。编者按:根据张升先生的调查,上述两册曾在汉堡大学后又不知下落的《永乐大典》,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张升:《德国汉堡大学所藏两册〈永乐大典〉的流传》,《国家图书馆学刊》2012年第6期)。

②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第37-38页。

③见下文表格卷14219-14220。

④这一册是笔者本人发现的。1997年4月,阿伯丁召开了一个纪念理雅各逝世100周年的会议。理雅各来自阿伯丁哈德利镇(Huntley),曾在中国传教多年,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及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会议期间图书馆的一次聚会上,我问在场的图书馆员,该馆有没有中文藏书,她唯一能想起来的就是一册黄色封面的大书,正文是朱、墨两色。这只能是《永乐大典》,第二天对这本书的鉴定证实了我的判断。幸运的是,《永乐大典》的尺寸——不同于其他中文图书——以及其独特的封面和装帧形式,使人印象深刻并很容易回忆起来。得知该书的重要性之后,图书馆上层立刻决定按照最高标准对这册《永乐大典》进行修复,因为它已经受潮并腐烂了。在拆开修复的过程中,他们趁机进行了数字化。见下文表格卷11907;修复情况见Megaw, A. & Sterlini, P: The conservation of *juan* 11907 of the *Yongle dadian*. *SSCR [Scottish 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journal* 12:2, 2001, pp12-15。

这样的机构很可能包括大学图书馆、乡村及宗教基金会的图书馆,甚至一些著名的学校。

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不但存放环境安全、条件好,而且修复情况也相当不错。与其他中文古籍相比,《永乐大典》受潮的比例更高,基本可以断定,这是当年使馆之围的结果。不幸的是,最早入藏的两册在修复时被做成了西式封面,一册在大英图书馆,另一册在博德利图书馆。这里要感谢翟理斯,是他发现了修复中的这一问题:

我的一个儿子,翟兰思……送给我五册(《永乐大典》),这是他当时抢救出来的;我以他的名义,将其中一册捐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另一册捐给了大英博物馆。后者被浪费了。《永乐大典》的尺寸是20×12英寸,黄色封面非常有特色,而当时大英博物馆中文部的负责人 Sir R. Douglas 让人对这本漂亮的书进行了裁切,并加了硬衬。^①

只有两例修复是必要的——一册藏于大英图书馆,另一册藏于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这两例是根据现代最高标准进行修复的,完全尊重书的原貌^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袁同礼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寻访现存《永乐大典》的下落,并为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对这些《永乐大典》进行拍照复制,以其他卷的仿抄本进行交换,这些仿抄本保留了原书的所有特征,不但尺寸和封面与原书全无二致,甚至对原书封面的修补以及所带有的《四库全书》的签条也保留了下来。这些仿抄本也并非没有意义,因此与后来不同时期的高质量影印版一样,作为附件列在下文表格的最后^③。

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已经分别于1960年和1984年被中华书局全部影印,只有5册例外,即大英图书馆两册,切斯特·比蒂图书馆两册,以及最新发现的阿伯丁大学图书馆的一册^④。大英图书馆两册中有一册格外珍贵,因为它与现存另外一册连起来就构成了完整的《相龙法》一书,里面还有一些有趣的插图^⑤。这一册与大英图书馆的另外一册以及切斯特·比蒂图书馆所藏

① Aylmer, C: The memoirs of H.A. Giles, *East Asian history* 13/14, 1997, pp42; 见下文表格卷 16343-16344, 19789-19790。

② 见下文表格卷 13201-13203, 11907; Megaw, A. & Sterlini, P: The conservation of *juan* 11907 of the *Yongle dadian*. *SSCR [Scottish 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journal* 12:2, 2001, pp12-15。

③ 在一封1929年12月28日写给牛津的苏慧廉(W.E. Soothill)教授的信里,当时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的袁同礼请求苏慧廉教授帮助他对博德利当时收藏的《永乐大典》进行拍照复制,他在信里还提到:“大英博物馆已经答应按照原书尺寸向我们提供《永乐大典》的照相复印件,用以交换我馆的仿抄本《永乐大典》。”

④ 见下文表格卷 11907, 13201-13203, 14219-14220。

⑤ 见下文表格卷 14219-14220。

两册于 2003 年被上海辞书出版社收入《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影印出版,因此,欧洲所藏《永乐大典》中唯一没被影印出版的就是阿伯丁大学收藏的这一册。

中华书局的影印版中没有收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永乐大典》中的乾隆皇帝的手稿,因为严格说来这不属于《永乐大典》,尽管它也很有价值^①。

欧洲所藏《永乐大典》卷目表

缩写

- A 阿伯丁大学
BL 伦敦大英图书馆
BOD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CBL 都柏林切斯特·比蒂图书馆
EM 柏林人种博物馆
PDF 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由亚非学院管理)
SB 柏林国家图书馆
SOAS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Y 袁同礼目录(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图书季刊》新一卷三期,1939年)

Z 张忱石目录(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R, R* 收入中华书局 1960/1984 年影印版

H 收入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年影印版《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

引文均用引号标注。

所有藏书都有原书封面,没有《四库全书》的签条,除非另有说明。

^①见下文表格卷 11312-11313。

卷	馆藏地	备注
803 804 805 806	CBL C 1756	1954年9月21日,切斯特·比蒂通过 H.C. Lowe (供职于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及写本部,切斯特·比蒂的顾问)购买,同时购入的还有卷 10110-10112。当天写给 James Vere Stewart Wilkinson (曾任大英博物馆同一部门的副部长,但是 1946 年被切斯特·比蒂挖去当了图书馆馆长)的一封信里记录了这段购买的佳话。这封信证实了当天早些时候的一个电话:“今天早上 Col. Brazier 走了进来,我碰巧在 Mac (应该是 Henry McAleavy) 的办公室;当时他正打算将这两册《永乐大典》以 100 英镑的价钱卖给 K.& P。我说我可以帮他卖到 110 英镑,他说他希望卖到 120 英镑,我们最终以这个价格成交;他很高兴,我更高兴。”据次日(1954年9月22日)的另一封信记载,切斯特·比蒂的秘书 John Wooderson 中午 12 点去大英博物馆取回了这两册《永乐大典》。这两封信现在都保存在切斯特·比蒂图书馆的档案室(切斯特·比蒂档案 474)。卷 803-806 及卷 10110-10112 都存放在黄绢封面的函套里,其结构和题签表明是在北京制作的。Col. Brazier 就是 William Russell Brazier, 1897 年出生于阿伯丁,白菜喜的儿子。白菜喜于 1922 年将一册《永乐大典》(见卷 11907)捐给了阿伯丁大学。因此这三卷的来源都可追溯至使馆之围。H.
807 808	BOD MS.Chin.a. 17(Arch. O.a.61)	MS.Chin.a.17-23 的 7 册《永乐大典》都是 1950 年 11 月由东方图书部部长 A.F.L. (“Freddie”) Beeston 从 James Cleugh 手里购买的,价格是 100 英镑(博德利图书馆新馆 127 房间,一个标注“中文”的盒子里的通信)。这 7 册《永乐大典》“据说曾经归宝士德(H.B.Bristow)所有,他在 19 世纪 70 年代曾经是英国驻天津领事馆工作人员” ^① 。Bristow 是 South Lynn, Norfolk 一个酒吧老板的儿子,1867 年 18 岁的时候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后来成为英国驻芝罘和天津的领事。1897 年,他因健康原因退休,似乎不曾参与使馆之围。但是,他的儿子宝述德(H.H.Bristow),一位“实习译员”曾经参与了使馆之围 ^② ,这 7 册《永乐大典》很可能是他当时获得的。这几册《永乐大典》上均没有任何题词。Z. R.

①Beeston, A.F.L: Seven new volumes of *Yong-lo ta-tien*, *The Bodleian Library Record* 3, 1950-1951, p199.

②Giles, Lancelot: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a diary*, p180.

(续表)

卷	馆藏地	备注
903 904	EM I.D.34056a	1928年9月29日购自柏林(潘科)的斯泰老夫妇,同时购入的还有卷1033及13189-13190。这三卷都看不出来源。斯泰老参与了使馆之围,并因其在保卫公使馆中的表现而被莫理循大加赞赏,后者对他非常了解。使馆被围期间,他供职于清朝皇家海关。骆惠敏编的《莫理循通信集》有一个脚注对他进行了详细介绍 ^① 。柏林人种博物馆所藏4册《永乐大典》在20世纪70或者80年代均被重新装订过,只有封面被保存了下来,而且是分开保存的。天头地脚处有水渍。Z.R.
913 914	BL Or.11755	1943年由 Cecil Kirke 先生捐赠,同时捐赠的还有另外5册:卷3002,6850-6851,7389-7390,8089-8090及20181-20182 ^② 。Cecil Kirke 先生1943年11月14日写给大英博物馆的信里写道:“在1900年的使馆之围事件中,我得到了6册来自翰林院的《永乐大典》。如果这些书对博物馆有用,我非常乐意将他们捐给博物馆。”(大英图书馆档案)Kirke很可能就是C.C.A. Kirke,使馆被围时他是“实习译员” ^③ 。日戳是1944年。有《四库全书》的签条。Y.(只有“长兴王氏”的卷914)Z.R*.
1033	EM I.D.34056b	见卷903-904。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天头地脚有水渍。Z.R.
1036 1037	BOD MS.China.18 (=Arch.O.a.6/2)	见卷807-808。有《四库全书》手写签条的痕迹。Z.R.
3002	BL Or.11756	见卷913-914。日戳是1944年。Z.R*.
3944 3945	SOAS MS.48364 [1]	1946年2月25日与卷13629一起入藏、一起编目,来自“莫理循博士”。据推测,此人即《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莫理循(见上文)。封面损坏严重,重新装订时上下颠倒。Y.Z.R.
4908 4909	EM I.D.24808	1910年7月购自清朝皇家海关总税务司伦敦办事处的 Leslie Sanderock。原书封面(见卷903-904)非常脏,天头地脚有水渍。Z.R.
5244 5245	BOD MS.China.19 (=Arch.O.a.6/3)	见卷807-808。封面题签未见。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Z.R.

①Lo Huim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G.E. Morrison, 2, 1912-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545.

②McAleavy, H: More remains of the greatest Chinese encyclopaedia *Yong lo ta tien, The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15, 1941-1950, p36.

③Giles, Lancelot: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a diary*, p180.

(续表)

卷	馆藏地	备注
6641	BOD MS.Back-house 1a (=Arch.O.a.6/8)	编号为 1a-k 的 11 册《永乐大典》是 1913-1922 年分批入藏的巴克斯藏书(Backhouse Collection)的一部分。尽管在北京的外国人里,巴克斯总是独来独往,但是他也参与了使馆之围。与巴克斯藏书中的其他书籍一样,这部分《永乐大典》上没有任何题词,也没有任何文字能证明藏书的主人是谁。封面题签未见,有编者名字的半页也未见。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Y.Z.R.
6850 6851	BL Or.11757	见卷 913-914。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Z.R*.
6933 6934	BL Or.12674	1961 年 11 月 21 日购自巴思(Bath)的 M.Poole 夫人,价格是 52 英镑 10 先令。M.Poole 夫人已故的丈夫普尔上校曾经负责护卫毗邻翰林院的英国领事馆(见上文)。Grinstead 曾撰文详细介绍该册《永乐大典》的入藏经过 ^① 。文章引用了普尔未出版的日记片段,并刊登了一幅普尔在翰林院的照片,当时翰林院已经部分毁坏。这篇文章介绍了翰林院被毁的种种细节。R*.
7078 7079 7080	SB Rara OA 2° 891338	20 世纪 80 年代购自傅吾康,价格是 20000 德国马克,傅吾康得自何处尚不清楚。张忱石的目录中将其标注为“科隆基莫”,不知何意。中华书局根据缩微胶卷将其出版,收入 1984 年影印版中。这一册品相良好,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购入之前封面曾经修复过,天头地脚有水渍。Z.R*.
7389 7390	BL Or.11758	见卷 913-914。日戳是 1944 年。Z.R*.
7515 7516	BOD MS.Back-house 1b (= Arch.O.a.6/9)	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这一册的题签上写着包含卷 18203-18206,中华书局 1960/1984 年影印版均未收入,现在下落不明。几乎可以肯定,这册《永乐大典》到达西方之前标签就已经弄错了。Y.Z.R.
7677	BOD MS.Back-house 1c (= Arch.O.a.6/10)	封面题签未见。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Y.Z.R.
8021	BOD MS.Back-house 1d (=Arch.O.a.6/11)	封面题签未见。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Y.Z.R.
8022 8023 8024	BL Or.12109	1952 年 6 月 17 日购自 R.C.Wilkinson(大英图书馆档案 ff.53.M. Lunan 18.6.1952)。有《四库全书》签条。封底上下颠倒。Z.R*.

①Grinstead, E.D: *The Yong-lo ta-tien: an unrecorded volume, The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26:1/2, 1962, pp30-33.

(续表)

卷	馆藏地	备注
8089 8090	BL Or.12109	见卷 913-914。日戳是 1944 年。有《四库全书》签条。R*。
8268 8269	BL Or.11272	“邓罗 (C.H.Brewitt-Taylor) 先生捐赠。1931 年 2 月 14 日。”翟林奈记录了这一册以及邓罗捐赠的另外两册 (卷 8275 及 18244-18245) 的情况 ^① 。邓罗 (1857-1938) 曾任清朝皇家海关税务司, 参与了使馆之围。Cannon 认为, 这三册“几乎可以肯定是在有人在使馆之围中趁火打劫得来的, 而邓罗则是购买 (而不是直接掠夺的)” ^② 。据 1930 年 1 月 30 日写给翟理斯的一封信 (大英图书馆档案) 记载, 邓罗先是将这几册借给大英博物馆, 请博物馆写了收据, 以便日后可以索还; 在 1930 年 12 月 18 日的另一封信里, 他说自己丢失了收据, 希望将这几册捐赠; 1931 年 1 月 4 日的信里, 他说找到了收据并随信附上, 他补充说: “现在你们可以销毁这张收据以及其他一切能证明这几册《永乐大典》曾经属于我的证据。”Cannon 将他的所作所为解释为对“证明他与《永乐大典》及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掠夺有关的证据”的敏感。有《四库全书》签条。Y.Z.R.
8275	BL Or.11273	“邓罗先生捐赠。1931 年 2 月 14 日。”见卷 8268-8269。书品极差。未做修复。有《四库全书》签条。Y.Z.R.
10110 10111 10112	CBL C 1757	见卷 803-806。该册从书脊至切口处均有水渍及霉菌, 据此推测, 当初浸水时可能是切口朝下。黄绢封面应该是原书封面, 但是内衬已经变得很软了。书页上有一个红色的中文名字“白莱喜”, 是 James Russell Brazier 的中文名字。H.
10115 10116	SOAS MS.83398	1955 年 7 月 6 日入藏, E.Edwards 教授遗赠。1913 年, 叶女士 (Evangeline Dora Edwards) (生于 1888 年) 前往中国传教。在北京经过为期两年的语言学习之后, 她于 1915 年成为奉天女子师范学堂的校长, 在那里她遇到了邓罗。1919 年, 她离开奉天回到英国。1921 年, 她被任命为亚非学院讲师, 随后晋升系主任 ^③ 。她究竟是从邓罗手里抑或其他途径得到这册《永乐大典》不得而知。尽管邓罗将他的全部中文资料都遗留给了叶女士, 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费尽心思地处理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见卷 8268-8269)。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这册损坏严重, 封面修复过。Y.Z.R.

①Giles, Lionel: Volumes of a manuscript Chinese encyclopaedia, *The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6:1, 1931, pp11-12.

②③Cannon, I.C: Public success, private sorrow: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 (1857-1938), China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translator. *Unpublished typescript*. p61, pp90-91.

(续表)

卷	馆藏地	备注
10135 10136	BOD MS.Back-house 1e (=Arch. O.a.6/12)	封面题签未见。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有浸水损坏的痕迹。Y.Z.R.
10460	BOD MS.Back-house 1f (=Arch. O.a.6/13)	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这一册的题签上写着含卷 20428, 收入中华书局 1960/1984 年影印版。据袁同礼的书目记载, 这一册藏在国立北平图书馆, 但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录中未见此册 ^① 。Y.Z.R.
11312 11313	PDF (没有排架号, 但标注“存放于 G 柜”)	与 PDF 所藏其他书一样, 来源不详。“1951 年 7 月 31 日”。这一册尤为珍贵, 因为它包含有乾隆皇帝的手稿。该手稿是一张对折纸, 尺寸与原书相同。卷 11312 中除了前 10 页, 其余均为宋代倪思的《重明节馆伴语录》, 手稿即为乾隆皇帝对此书的批注, 上面还有三个乾隆玉玺。Z.R.
11887 11888	BL Or.6814/1	“购自鲁扎克公司。1907 年 4 月。”参见卷 11376-11378。鲁扎克书店 1908 年目录, 第 19-20 页 (第 168 条)。当时大英图书馆以总价 159 英镑 10 先令购进 899 册书, 这是其中之一 (大英图书馆档案)。“36 页。20/10/23, E.G.S.”曾经受过潮, 有霉菌的痕迹。Y.Z.R.
11903 11904	BL Or.7616	“白挨底 (M.H.Playfair) 先生捐赠。1911 年 11 月 11 日。”1911 年 10 月 25 日, 白挨底先生写道: “北京的翰林院失火的时候, 英国使领馆人员抢救了一部分, 我也得到其中一册。我请求将这册捐给大英博物馆。” (大英图书馆档案) 白挨底 (1850-1917) 1872 年起开始在使领馆工作, 1910 年退休。他是一名汉学家, 19 世纪的后 30 年里出版了不少重要的汉学著作。早期进行了不恰当的西式修复。《四库全书》批注写在小纸条上, 粘在修复时增加的卷首空白页上。Y.Z.R.
11907	A MS 1143	1922 年与其他中文资料一起捐赠给阿伯丁大学, 载《阿伯丁大学评论》(Aberdeen University review, 9) (1922 年 3 月, 第 163-164 页)。这批藏书原本属于白菜喜, 他曾经就职于清朝皇家海关总税务司。之前有水渍和霉菌。近期借数字化之机已修复。第 1 页下半部分及第 2-6 页是残页。全书共 39 页。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此册是新发现的, 截止目前未收入任何影印版。袁同礼书目中未著录。张忱石目录中记载,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卷 11905-11907 是清光绪年间文廷式抄本, 原书如何分卷未知 (阿伯丁所藏《永乐大典》部分地解答了这个疑问)。但是张忱石未提供该卷的馆藏地。中华书局影印本用的是清光绪抄本。

^①编者按: 此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续表)

卷	馆藏地	备注
13189 13190	EM I.D.34056c	见卷 903-904。天头地脚有水渍。Z.R.
13193 13194	SOAS MS.128052	1959年8月5日由考陶德艺术学院(the Courtauld Institute)转让。书是完整的,但是有很多书页卷角,封面及封底脱落。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Y(当时还在“英国某氏”手里)。Z.R.
13201 13202 13203	BL Or.13292	“1970年11月”。1970年11月购自 Colletts (C.D.Houston 先生的代理),价格是45英镑(大英图书馆档案)。书页似乎被粘错卷了。原书的纸捻已经被使用了,但是没有卷尾白页,封面是全新的。卷13201仅存第19页(最后一页);卷13202存第1-12页、15页(缺13、14页);卷13203存第1-4页、6-18页(缺第5页)。H.
13340 13341	BL Or.12020	“ff.31.M.Lunan 1952年6月18日”。已修复。封面题签丢失。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Z.R*.
13496 13497	BL Or.11658	封面里面有两封信,都寄自“海军出纳员 Herbert A. Gyles”,信笺上的信头是“H.M.S.Actaeon, Sheerness”。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916年12月22日,先提到寄信人与收信人(汉学家翟理斯, Herbert A. Giles)名字非常相似,然后提出将这册捐给大英博物馆,并注明卷数。第二封信的日期是1916年12月29日,确认该书已被接收。封底上的题词似乎是错的:“1938年11月22日购自 A.C.Moule 教授。”雪上加霜的是,封底上还贴着鲁扎克书店1926年目录中《永乐大典》卷19737-19739这一条;事实上,这一册由罗兰·亚伦卖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见下表)。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Y(不过里面的“翟理斯教授”容易误导人;这册《永乐大典》真正的主人并不是翟理斯教授,而是与他名字相似的海军军官 H. A. Gyles)。Z.R.
13498 13499	BL Or.11172	“……1900年6月4日至8月14日使馆被围期间,公使馆工作人员窦尔慈(B.G.Tours)先生从翰林院抢救了这册《永乐大典》,并送给了同样供职于公使馆的 A.J.Sundius 先生,后者又将它转赠给我。1908年4月29日。暮稼谷(G.E.Moule)。”“暮雅德(A.C.Moule)赠送。1929年12月14日。”窦尔慈(1863-1946),可能是荷兰裔,1894年开始供职于英国公使馆,参与了使馆之围,当时是使馆会计。Hoe 大量使用窦尔慈家族手稿。并有一张他的照片。Sundius(1863-1933),应该是瑞典裔,1884年起供职于公使馆,但是1900年时在南京。暮稼谷是暮雅德的父亲。早期进行了不恰当的西式修复。Y.Z.R.
13629	SOAS MS.48364 [2]	见上表卷3944-3945。封面修复得非常糟糕,而且重新粘的时候上下颠倒了。Y.Z.R.

(续表)

卷	馆藏地	备注
13872 13873	BOD MS.Chin.a. 20 (=Arch.O.a.6/ 4)	见卷 807-808。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Z.R.
13874 13875	BOD MS.Chin.a. 21 (=Arch.O.a.6/ 5)	见卷 807-808。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Z.R.
13876 13877 13888	BL Or.68142	“购自鲁扎克书店。1907年4月。”见卷 11887-11888。有《四库全书》签条。Y.Z.R.
13992 13993	BL Or.11346	“杰弥逊爵士 (James W. Jamieson, K.C.M.G.) 赠送”。卷前空白页上粘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死后这本书不得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理,要送给大英博物馆。杰弥逊。1914年2月10日于广州。”1932年的日期戳是盖在纸条上而不是书上的。杰弥逊向翟理斯赠书的信日期是1931年12月18日(大英图书馆档案)。杰弥逊(1867-1946)于1886年起供职于领事馆,1899-1909年期间任英国驻中国公使馆商务帮办(1905-1908年间被临时调派至德兰士瓦),1909-1926年间任广州总领事,后来调至天津,1930年退休。翟林奈记录了这一册的入藏过程 ^① 。西式封面。Y.Z.R.
14219 14220	BL Or.14446	1988年7月,(国防部的)John Lovell以Caroline Moore夫人的名义向大英图书馆开价,随后于1989年2月成交。据Lovell介绍,该册于1901年由士兵Tickner得自翰林院。仅内文部分幸存,外部书页有损坏及污渍。未修复。史料价值极高,因为这册含有《相龙法》插图。H.
14385	BOD MS.Back-house 1g (=Arch.O.a.6/14)	有《四库全书》签条。Y.Z.R.

^①Giles, Lionel: A volume of a manuscript Chinese encyclopaedia, *The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6:4, 1932, pp97-98.

(续表)

卷	馆藏地	备注
14607 14608 14609	BOD MS.Chin.b.9 (=Arch.O.a.6/ 20)	“北京 1900 年。1900 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抢救出的一册……火是中国人放的, 目的在于烧向毗邻的英国使领馆。T. Biggin。”书里附有一封 Thomas Biggin 1907 年 2 月 20 日写的信:“毫无疑问,你们在此之前已经收到了来自曼彻斯特博览会(Manchester Exhibition)的一册。这是一部中国百科全书中的一册……我有两册,刚才提到的那册已经送给你们……因为我相信对于博德利这样的机构来说,这种书还是有价值的。”据这封信记载,Biggin 先询问博德利是否想要这册《永乐大典》,然后将其用于“两个博览会”。信里没有提到另一个博览会,也不知道他手里的另一册《永乐大典》的下落。在 Madan 的《博德利图书馆所藏西文稿本提要》(<i>Summary catalogue of western manuscript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i>)里,这册《永乐大典》的编号是 33981,提要确认该册于 1907 年入藏博德利,但是除此之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书里还附有一封 1922 年 11 月 5 日来自科隆(Colonge)的 J. G. Birch 中校的信以及三张照片。信里说:“1900 年北京的翰林院失火的时候,一小部分《永乐大典》被抢救出来;其中大部分被归还给中国政府,小部分被欧洲人带走。其中一册由翟理斯赠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照片里的三册是由一个德国军官抢救出来的,现在打算出售。我觉得这些应该被英国收藏。大英博物馆说他们想要但是没钱。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帮忙联系。”三张照片分别是卷 920、5343 及 13450 的第一页。结果,这三册被莱比锡大学(Leipzig University)获得,1955 年 12 月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归还中国政府,现在都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西式封面,原书封面丢失。Y.Z.R.
14622	BOD MS.Back-house 1h (=Arch. O.a.6/15)	封面题签未见。Y.Z.R.
14627	BOD MS.Back-house 1i (=Arch. O.a.6/16)	封面题签未见。Y.Z.R.
15073 15074 15075	BOD MS.Chin.a.22 (=Arch.O.a.6/6)	见卷 807-808。有《四库全书》签条。上半部分有大片的水渍及霉菌。Z.R.

(续表)

卷	馆藏地	备注
15955 15956	BL Or.11543	“Couling 夫人捐赠。1935 年 2 月 9 日。”这一册之前归北京的莫理循所有 ^① 。Couling 夫人于 1935 年 1 月 20 日写给翟理斯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拥有的那册《永乐大典》已经寄到了，还没有拆包。我想把它转让给你，跟你一起打开。你能定个时间吗？”（大英图书馆档案）Y.Z.R.
16217 16218	BOD MS.Chin.a. 23 (=Arch.O.a.6/ 7)	见卷 807-808。有《四库全书》签条。上半部分有大片的水渍及霉菌。这一册的内容是冠礼。Z.R*.
16343 16344	CUL FH.20.71	“英国领事官、毕业于基督学院的翟兰思先生赠送剑桥大学图书馆，1901 年 4 月 16 日。”见卷 19789-19790。有《四库全书》签条的痕迹。天头地脚及书口处有水渍。Y.Z.R.
18244 18245	BL Or.11274	“邓罗先生赠送。1931 年 2 月 14 日。”见卷 8268-8269。内容是《营造法式图》。Y.Z.R.
19735	BOD MS.Back- house 1j (=Arch. O.a.6/17)	Y.Z.R.
19737 19738 19739	CUL FH.20.72	日戳是 1926 年 11 月 28 日。封二处用铅笔标注“R·亚伦神父”“50 英镑”（剑桥大学图书馆以前的惯例是用这种方式记录购书细节）。但是，这一册曾经出现在鲁扎克公司当年的书目上（第 70 条），标价是 35 英镑。书里附了一张暮雅德的纸条这样写道：“这一册曾经归罗兰·亚伦所有，他是 1900 年北京英国公使馆牧师。”亚伦是牛津大学的硕士，他是最早出版使馆被围日记的人之一。封面曾经修复过，重新粘的时候里外粘反了，很可能是入藏图书馆之后修复的。Y.Z.R.
19740 19741	BL Or.12021	“ff.36.M.Lunan 1952 年 6 月 18 日”。Z.R*.

^①Arousseau, L: [Review of Miao Quansun's 缪荃孙 Qingxuebu tushuguan shanben shumu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 Shanghai, 1912].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2:9, 1912, p80, p86.

(续表)

卷	馆藏地	备注
19789 19790	BL Or.5982	“翟理斯教授捐赠。1901年4月13日。”但是,书中附的翟理斯的信的日期是1901年4月1日,而且信里说得很明白,这一册是“以我儿子,英国领事官翟兰思的名义”捐赠的。翟理斯在其回忆录里这么写道:“我的一个儿子,翟兰思……送给我五册(《永乐大典》),这是他当时抢救出来的;我以他的名义,将其中一册捐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见卷16343-16344),另一册捐给了大英博物馆。后者被浪费了。《永乐大典》的尺寸是20×12英寸,黄色封面非常有特色,而当时大英博物馆中文部的负责人 Sir R. Douglas 让人对这本漂亮的书进行了裁切,并加了硬衬。” ^① 但是,翟兰思在自己的日记里说翰林院大火之后,他只抢救了1册而不是5册:“我得到了卷13345 (!!),仅仅是作为一个标本而已。”但是这一册(实际上是卷13344-13345)与上述翟理斯所藏5册中的其余两册(卷19742-19743与19792)一样,现在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西式封面,原书封面则被粘到了里面。Y.Z.R.
19865 19866	CBL C 1758	卷端用铅笔轻轻写了“1900年7月翰林院”几个字。缺原书封面,内文被存放于西式皮革包边的文件夹式的书套里。最后几页有水渍。书套里贴了1914年1月6日《泰晤士报》的剪报:“Wilfred Merton 先生将著名的中国百科全书里的两册借给伦敦图书馆,从今天开始为期几周。他很幸运,当初以较低的价格从伦敦的一个书店购入。该册《永乐大典》包含卷19865-19866,内容是竹,已由来自 Eadburgha Bindery, Broadway, Worcestershire 的 Katherine Adams 小姐精心装订。”切斯特·比蒂图书馆的档案里保存了两封袁同礼写给 Merton 的信,日期分别是1929年11月21日和1931年3月6日(Chester Beatty Papers 1367)。第一封信里提到袁同礼1928年春天完成的对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的统计工作。在这份统计表里,袁同礼记录了 Merton 拥有一册《永乐大典》,即卷19865-19866。他请求 Merton 提供这一册及他拥有的其他任何册的抄本或照相复印件,作为交换, Merton 可以获得他统计表中藏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同样数量的抄本或者照相复印件。第二封信提到袁同礼1923年前往位于 Richmond Hill 的家里拜访 Merton,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卷19865-19866。他再次要求提供照相复印件,由大英博物馆的翟林奈复制并寄给他。Wilfred Merton (1888-1957)是切斯特·比蒂的朋友及顾问,1954年8月19日,他将这册捐给了切斯特·比蒂图书馆。Y.Z.R*.H.(仅有卷19866,含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版里未见的第8a页,可能是1931年照相复制的时候偶尔遗漏的)

①Aylmer, C: The memoirs of H.A. Giles, *East Asian history* 13/14, 1997, p42.

(续表)

卷	馆藏地	备注
20139	BOD MS.Back-house 1k (=Arch. O.a.6/18)	封面、封底都被替换了,但是与原书非常相配:不但未见封面题签,而且似乎从来就没有过。Y.Z.R.
20181 20182	BL Or.11760	见卷 913-914.日戳是 1944 年。Z.R*.
20850 20851	BL Or.8159	“清朝海关专员 E.Gordon Lowder 赠送大英博物馆。1917 年 1 月。”在 1917 年 1 月 16 日的信里,E.Gordon Lowder 说这一卷是在“北京的使馆之围结束后不久,从翰林院的废墟里抢救出来的”(大英图书馆档案)。不恰当的西式修复。Y.Z.R.

附表:复制品

抄本		
2948 2949	BL Or.11238	“国立北平图书馆赠送。1930 年 10 月 11 日。”也有《四库全书》签条。
2950 2951	BL Or.11227	“国立北平图书馆赠送。1930 年 6 月 14 日。”也有《四库全书》签条。
3527 3528	BL Or.11536	“国立北平图书馆赠送。1934 年 10 月 13 日。”
7104 7105	BL Or.11239	“国立北平图书馆赠送。1930 年 10 月 11 日。”
7701 7702	BL Or.11253	“国立北平图书馆赠送。1930 年 10 月 11 日。”
7889 7890	SOAS MS.128656	也有《四库全书》签条。
7963	SOAS MS.128658	
8909 8910	BL Or.11254	“国立北平图书馆赠送。1930 年 10 月 11 日。”也有《四库全书》签条。
13822 13823 13824	BL Or.11537	“国立北平图书馆赠送。1934 年 10 月 13 日。”
同上	SOAS MS.128657	
20197	BL Or.11538	“国立北平图书馆赠送。1934 年 10 月 13 日。”
22761	BL Or.11255	“国立北平图书馆赠送。1930 年 10 月 11 日。”
印本		
665 666	BL Or.13995A	日戳是 1974 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Kyoto Daigaku Jimbun Kagagu Kenkyujo) 藏书的复制品。1973 年由该研究所出版。

(续表)

同上	CUL FH.980.181	
3518 3519	BL Or.13995B	日戳是 1984 年。山东掖县发现《永乐大典》残卷的复制品，该册后来上交国家。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影印出版。
2610 2611	BOD MS.Backhouse 11(=Arch.O.a.6/19)	这册影印版《永乐大典》特别有说服力，因为影印过程中对原书封面的修复情况也体现出来。1926 年由傅增湘影印出版。尽管这一册有巴克斯藏书 (MS. Backhouse) 的排架号，但它既不是稿本，也不是巴克斯 (Backhouse) 捐赠的一部分，因为赠书是 1913-1922 年之间陆续入藏的。来源未知。
7322 7323 7324	CUL FH.20.70	美籍华人孙以庄于 1983 年 10 月赠给上海图书馆的一册《永乐大典》的影印版。

在为本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尤其是查找藏品来源的过程中，我得到以下同事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大英图书馆的吴芳思 (Frances Wood) 和 Graham Hutt，剑桥大学图书馆的 Charles Aylmer，阿伯丁大学图书馆的 Myrtle Anderson-Smith，以及切斯特·比蒂图书馆的 Laura Muldowney。

【作者简介】何大伟，文学硕士，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研究方向：文学。许海燕，文学硕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编审。研究方向：文学。邵玉书，汉学和图书情报学硕士，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研究方向：汉学和图书情报学。刘楠楠，翻译学硕士。研究方向：德汉哲学文本翻译。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六

二支

小兒卒死

小兒卒死 泉元方病深小兒者死者是三虛而過賊風故無病倉卒而死也三虛者...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七

二支

詩

乃曰事求遠道中為詩寄西府日帝恐為年製特前奏朕備學古辭雅者...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四十一

十八陽

鄉儀

鄉儀 善俗十書賓儀相元 表牙 往還 水冠 刺字 進送...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四

十三蕭

遼

遼 洪武正韻遼條切遼也又水名許慎說文遼以支秦洛蕭切蕭野王...